

非洲水利工程的文明互动：以卡里巴大坝为例

张 瑾

摘 要：非洲传统的“人-水”关系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表现为当地人在河谷地带逐水草而居，依靠酋长权力进行物质分配，并依据传统信仰生活，与外界联系很少。殖民国家进驻非洲后，推行的大型水利设计让非洲传统社会在发展中被边缘化，坝区原有的信仰、家园、生计改变，人的社会地位尚不及国家公园的动物。即使在非洲民族国家获得独立后，当地人在近代社会变迁中仍无力把握转型契机，权益不断被损害。直到 21 世纪中国承建卡里巴大坝扩建工程，改善当地社区条件，本土居民与外界的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文章通过卡里巴大坝案例，以坝区通加民族的转变为线索，展现了田园牧歌式的非洲“人-水”关系与外部世界关系变化的历史，同时探讨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内在的关联。

关键词：水利史；水历史；卡里巴大坝；通加民族；文明互动

中图分类号：K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5)04-0014-(10)

DOI:10.13852/J.CNKI.JSHNU.2025.04.002

一、引言：从非洲水利史转向非洲水历史的研究

水利活动起源很早，相关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远古人类择丘陵而处，逐水草而居，继之出现防洪、供水问题；剡木为舟，结网而渔，继之出现航运和水产问题；抱瓮灌园，桔槔取水，继之出现灌溉及水利机具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记录和探讨，形成了水利史。由于非洲历史发展的客观原因，对于非洲水利史的研究更多地由西方国家或国际组织主导，针对具体项目做出可研报告，注重对个案的研究，关于非洲水利史的学理方面探讨较少。然而，长期以来，非洲民族的用

水习俗、水权分配原则与国家权力、宗族组织、民间秩序、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水在非洲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对非洲而言，重要的不是单纯的“水利史”研究，更应该关注“水历史”的研究，以展现曾经被忽视的、可以更全面被研究的非洲历史。

卡里巴位于赞比西河谷水能资源最丰富的峡谷区，原是通加等当地民族生存居住的区域。那里水能资源丰富，后建成的“卡里巴大坝”是世界上库容第一的水库和电站。卡里巴大坝于 1955 年开始修建，1958 年至 1963 年完成水库蓄水。自建成以来，卡里巴大坝已为两岸国家——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提供了逾 50% 的电力，惠及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儒学国际传播情况的区域国别调查研究”(23STA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瑾，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 200234)。

450 万人。^①然而,卡里巴大坝在整个非洲历史中的负面形象超过正面形象。一方面,尽管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是一个创新的设计,但由于政局变动和大功率泄洪消能技术不佳,加上赞比西河下游河床裂隙发育、加固措施不足,卡里巴大坝在建设期间就出现溢洪现象,虽经多次修复,但仍对坝下岩石造成了严重冲蚀。卡里巴大坝是六个千亿立方米水库量级中地震最频繁的,建成后不到十年,可测到的地震次数就超过 2000 次,其中周边最大震级达到 6.1 级。^②另一方面,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大坝控制了赞比西河(赞比亚境内)90% 的径流,由于水库沉积和反硝化作用,原有土地中 90% 的磷和 70% 的氮损失,泥沙向下游湿地的输送减少,甲烷排放较高,这导致了多种动植物的变迁。^③卡里巴水库淹没了 5580 平方公里的土地,导致大量动植物灭绝。殖民者没有兑现对原住民“通加人”(Tonga)的承诺,当地人失去生计、被迫迁徙、最终被边缘化。^④虽然他们在建国前后一直争取发展权益,但仍屡次被排除在议程之外。

21 世纪之后,卡里巴大坝的发电量不足以满足国家需求,而且持续出现结构性险情,溃坝风险日益加剧。赞比亚和津巴布韦都公开向国际社会求助,希望募集费用修缮大坝。多国针对坝体讨论新的水电修复方案和坝址方案。^⑤2009 年,由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承建的赞比亚卡里巴水电站北岸扩建工程举行奠基仪式。2018 年,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承建的卡里巴南岸水电站扩机工程竣工。中国在保障大坝两岸国家用电需求的同时,加固了堤防,并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安置工程。这些举措得到当地从高层到民间的广泛赞誉,展现了一

种与以往外部力量不同的新气象。

二、卡里巴坝区传统非洲水历史:“水乡牧歌”

作为地名的卡里巴(Kariba)是和当地的“通加人”一起出现的。其书面记录始于 1860 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在赞比西河的巡游。那时,他在赞比西河顺流而下,水流忽然变得湍急,“水中的一些岩石……错位、弯曲,甚至扭曲到了惊人的程度,立刻证明了大自然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动荡和痉挛……在大自然目前安静的运作中,我们可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匹敌”。利文斯通根据当地通加人的描述,将这个地方命名为“卡里巴”,但这个词实际上指的是急流下的一块岩石,据说河神雅米雅米(Nyaminyami,以下简称“雅米神”)就住在那里。^⑥雅米神形似一条蛇,时常需要弓背运动,否则就会情绪非常激动地搅动水面。利文斯通和后来的探险家不相信这些神话,但因为此地的水流实在太湍急,超过了当时欧洲的航行能力,故将其记录在案。照片、图像和其他的记录则来自 1903 年“罗德西亚科学协会”(Rhodesia Scientific Association)的报告。^⑦在卡里巴大坝建设之前,“通加人”自称“巴西尔维齐河人”(Basilwizi 或 BaMulonga),意思是“河流中的人”。本文的“通加人”指代范围较广,包括赞比西河沿岸世代居住在贵恩贝山谷(Gwembe)、受到卡里巴大坝影响的原土著通加人(Tonga)和克克人(Kore Kore),其中以通加人为绝大多数。因卡里巴大坝的兴建,这个群体约有 57000 人被迫迁徙出原来的居住地,迁至高地宾加(Binga)地区,失去了原

① 《赞比亚时报》2015 年 1 月 7 日。转引自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k/201501/20150100864271.shtml>。

② D. I. Gough, W. I. Gough, “Load-induced Earthquakes at Lake Kariba-II”, *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 Vol. 21, No. 1 (1970), pp. 79-101.

③ 鳄鱼、两栖河马和羚羊数量急剧减少,捻角羚数量增加,高角黑斑羚成为数量最多的群体。直到新的鱼雷草和铺地黍等植物再次生发加之国家公园进行保护时,河马和非洲水牛等的数量才重新恢复。大量树木死亡,藻类、浮游植物和长额象鼻鼯类型的浮游生物数量增多。20 世纪 80 年代初,香附子石苇和蓼类植物盛开,吸引像红嘴奎利亚雀这类的鸟类聚集。笔者根据津巴布韦马图萨多纳国家公园讲解员 R. Taylor 口述访谈资料整理。

④ 这方面的新闻报道比较多,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弘扬地方“民族主义”并指责津巴布韦政局的有利佐证,研究包括 M. F. C. Bourdillon, A. P. Cheater and M. W. Murphree, *Studies of Fishing on Lake Kariba*, Gweru: Mambo Press, 1985. B. Anderson,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p. 6. 等。

⑤ 郭宗麒:《卡里巴大坝的改造建模》,《科技经济导刊》2017 年第 21 期。

⑥ J. McGregor, “The Great River: European and African Images of the Zambezi”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 View of the Land’ conference, Bulawayo, Zimbabwe, 2000) and J. Moore, “A Dam on Zambezi”, *National Archives of Rhodesia Occasional Papers*, Vol. 1 (1965), pp. 41-59.

⑦ H. de Lasseo, “The Zambezi River (Victoria Falls-Chinde): A Boat Journey of Exploration, 1903”, *Proceedings of the Rhodesia Scientific Association*, Vol. 8, No. 1 (1908), pp. 19-50.

有在洪泛区的生计。

通加人原来的主要聚居区在赞比西河谷的卡里巴地区,他们现居住于马拉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地,语言属班图语系。一直以来,通加人的生存、扩散和发展都与水有关。在卡里巴大坝建造之前,外界对通加民族的印象大体有两种:第一种是通加人只有两个脚趾,并且有尾巴;第二种是通加男女都抽水烟。^①前者神话了与世隔绝的通加民族,后者则确实是通加人的日常生活和休闲方式。直到今天,津巴布韦普通民众对通加民族的生活仍不甚了解,大致只知道他们居住在卡里巴大坝附近,生活贫困,依靠政府及社会组织的援助维持生计。^②笔者在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查询文献时发现,涉及通加人的文献资料仅有约 50 篇,其中大部分是关于语言的描述。^③

根据通加人的口述,过去的通加民族对外界也知之甚少。他们原先居住在一个名叫卡里瓦的山谷(Kaliwa gorge)之中,一直过着水乡田园生活。由于离群索居,他们有独立的文化遗产,在雅米神的护佑下进行生产劳作。雅米神是赞比西河的河神,通常的形态是漩涡或者一条水龙,有蛇身鱼头。雅米神和他夫人的住所在如今卡里巴大坝坝墙附近的巨石之下,两位水神管控赞比西河流域与水相关的一切生灵。只要有人试图驾独木舟路过水神住所,很快就会陷入水涡不能出来,通加人称之为“陷阱”或“圈套”(Kariva/Karinga/Kariba),音译为“卡里巴”,这也是峡谷和湖名称的来历。部族长老和灵媒(巫师)拥有传统地位,在雅米神发怒时,他们负责和他进行沟通。通加人每遇险难,雅米神总会以各种方式出手相助,保佑通加人一世安康。通加人崇敬雅米神,从不去他的住所旁寻衅。桑帕卡卢曼(Sampakaruma)酋长表示他见过雅米神两面,那是在白人到达这个国家之后。^④

1888 年,罗德斯获得了恩德贝勒国王的土地

① 妇女们在一条漂亮的小黏土管里抽烟,底部有水,可以消除大部分的尼古丁。男人有不同的烟枪,这些烟枪不过滤尼古丁,因此烟味更浓。

② 笔者 2017 年在津巴布韦哈拉雷对当地居民的访谈,访谈对象有 Leo、Egline、Shumy、Mucttefa、Ringisayi、Munyaradzi 等。

③ 关于卡里巴大坝的词条有 219 条,但绝大部分为水利工程的具体数据和渔业的统计数据。

④ 通加人与白人首次谋面时酋长的名字,因卡里巴大坝而被记录在史册。参见 <https://rediscoveringafricaheritage.wordpress.com/2017/09/06/tonga-people-of-zambia-malawi-and-zimbabwe/>。

⑤ ESKOM: The Years of Establishment - “Electrifying our beloved country”, <http://www.eskom.co.za/sites/heritage/Pages/1923.aspx>。

⑥ R. White, *The Organic Machine: The Remaking of the Columbia Riv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5。

⑦ 故事来自笔者对津巴布韦大学教授 M 的访谈。M 教授是津巴布韦官方水利委员会的指导委员,负责官方大坝修建的工程监管和史料整理等工作。

开采权,并于 1895 年宣告建立殖民国家“罗德西亚”。1940 年左右,非洲电力供应组织(Electricity Supply Commission)对可行的电力项目进行调研,^⑤认为卡里巴地区的水力发电前景最好,可为殖民地日益增长的工业需要提供充足的动力。随后,一群白人便在下游 25 公里处安营扎寨,建立了奇闻度(Chirundu)测量站。尽管南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和北罗德西亚(今赞比亚)曾对大坝选址存在争议——因为卡夫河谷(Kafue River Gorge)似乎也是一个好的选项,但经过详细的勘探和预测,卡里巴大坝在建造可行性和经济效益方面更胜一筹,能够成为“推进经济发展、巩固资源丰富的新生国家”的大坝。用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的话说,卡里巴大坝建成后可以成为一台“有机机器”,规律的水流就是动力齿轮。^⑥紧接着,一群白人工程师便来到卡里巴峡谷卡拉村(Kraal)。^⑦他们告诉通加人,他们要在这里建造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水坝,而这个大坝将淹没通加人所有的土地,通加人应该离开。通加人表示拒绝,说雅米神不会同意这样做的。但白人没有放弃,几经周折找到了酋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询问如何才能得到雅米神的同意。酋长正襟危坐,说这只有问雅米神的意见了。在指定日期前,他们需要备齐礼物,分别是:白、红、黑色衣服若干,牛、羊若干,两桶啤酒,十五袋咖啡,两辆汽车以及其他物品——这些都是问询雅米神时需要献祭的礼物。白人们按照酋长指定的日期如数交纳了物品,并远离了村庄。两周之后,白人们再次拜访酋长,酋长带来了好消息:可以去田野调查了。白人们欢欣雀跃,立刻和酋长签署了合约,并强迫通加人离开。通加人同村的亲眷,因为合约不同,被分隔在赞比西河的南北两岸。

三、白人的杰作:卡里巴大坝

1. “光明和权力”的攻坚战

从历史的角度看,卡里巴水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北罗德西亚面临电力赤字的副产品。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欧洲移民泛滥,非洲人口被动膨胀,非洲各城市中心纷纷新建房屋,扩大铜矿开采活动。社会和经济的转型,迫使南北罗德西亚的政治家、矿工和工业家都认真考虑所需电力的问题。

卡里巴水库项目不仅是殖民当局改善财政的需求所在,也是为联邦发展进一步提供“光明和权力”的关键项目,是中非联邦消除财政赤字的项目^①和最核心的发展投资项目。《新闻周刊》后来甚至将其描述为“西方资本和专业技术的纪念碑”。^②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反对种族歧视的浪潮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但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观念最终成为年轻的中非联邦的政策取向。卡里巴水库项目被界定为:为非洲人创建“多种族伙伴关系”并推动非洲人发展的项目。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尽管白人声称黑白种族间是伙伴关系,但仍奉行种族隔离的激励政策,限制非洲人在立法、住宅、学校、法律、医学、工程等行业参与。联邦总理莫尔文勋爵傲慢地挫败了非洲人对联邦政府所谓的种族合作理想的信念,他表示,期望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伙伴关系类似于“马匹和骑手”。^③

因此,工业文明的领头羊英国以“高级合作伙伴”的身份领衔,国际复兴银行(IBRD)提供融资,连同赞比亚铜矿主等希冀日后分享电力成果的私人企业家,都支持建造卡里巴大坝,希望以此推动非洲向西方社会化转变。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尽管各方动机不一,经济利益和殖民强权最终促使新组建的联邦电力委员会(Federal Power Board)下定决心,按照既定计划推进大坝工程:招募投资、^④汇集设备、招募工人和资源,以加快启动大坝项目。委员会汇集了世界著名的市政工程专家和公司,^⑤合力兴建这个至今仍保持世界最大库容的水库。

此时,原先的通加人已经迁走,但随着建筑工人的到来和工程的开展,卡里巴镇反而成为人丁兴旺的地区。殖民当局委托理查德·科斯坦(Richard Costain)公司承建城镇。这里迅速发展出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种族隔离的、自给自足的城镇,并成为殖民地中最大的城市之一。卡里巴镇的基础设施包括房屋、商店、银行、医院、学校、教堂和娱乐设施(如游泳池和电影院)。根据合同,虽然理查德公司应该在24个月内开发所有设施,但是他们只用了19个月就完成了任务。据说,这是因为公司要求员工每天工作14到18小时,每周工作七天。^⑥同样地,基于非洲工人的超负荷工作,恩普西(Impresit)公司提前十个月建成大坝。非洲工人不仅面临欧洲管理人员的暴力威胁,还被迫接受低薪、强制加班、恶劣的卫生设施、简陋的住宿条件以及匮乏的食物供应。这些非洲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列强在非洲的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其中包括英属的北罗德西亚(今赞比亚)、南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及尼亚萨兰(今马拉维)这三个地区。为了平息当地逐渐高涨的独立声浪,英国政府决定合并此三地,于1953年8月1日正式成立罗德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Federation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或称中非联邦(Central African Federation),作为英国统治下的自治领,存在至1963年。

② Namwall Serpell, “Learning from the Kariba Dam”,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22, 2020,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7/22/magazine/zambia-kariba-dam.html>.

③ Eliakim M. Sibanda, *The 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1961–1987: A Political History of Insurgency in Southern Rhodesia*, Trenton, New Jersey: Africa World Press, 2005, p. 44.

④ 联邦电力委员会号召世界各金融机构为卡里巴项目捐款。从1956年上半年开始,世界各种金融机构为卡里巴项目提供了1.19亿英镑。最大的一笔贷款是来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的8000万美元,这是该银行为单个项目提供的最大贷款。还接收了其他一些支持:英国殖民发展公司(United Kingdom Coloni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mpany)1500万英镑、英国英联邦发展财务公司300万英镑、联邦政府3400万英镑。详见:Kariba Anon: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biggest Man-made Lake*, Bloemfontein, South Africa: The Friend Newspapers Limited, 1959, p. 17.

⑤ 亚历山大·吉布(Alexander Gibb)、安德烈·M·科恩(Andre M. Coyne)和让·贝里耶(Jean Bellier)以及巴黎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 d'Exploitations Industrielles)等机构,一起成为联合土木工程师团队。来自英国的麦克莱伦(McLellan)组建工程师团队(创始人麦克莱伦在1965年成立了同名工程技术公司,延续至今)、意大利建筑集团恩普希(Impresit,至今仍为意大利最好的建筑公司)获得了建造卡里巴大坝墙的主要合同。

⑥ Kariba Anon: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biggest Man-made Lake*, p. 23.

工人既有公司的员工,也有来自坦噶尼喀、贝专纳保护地(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安哥拉、刚果、葡属东非等临近非洲国家的劳工。这种劳动力构成并非体现真正的“多种族合作”,而是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等城市不断兴起的建设热潮所致。^①据统计,在卡里巴大坝建设期间,在由约2000名欧洲人和8000名非洲人组成的约10,000名工作人员中,有87人因为触电、被机器卷入或被落石击中死亡,他们大多数是非洲人。^②这些劳工中只有极少数的通加人。绝大多数的通加人已经被迫移居到卢萨卡高地,与干燥、不适宜种植谷物的气候做斗争,他们在后来的动物救援行动“诺亚方舟行动”中受雇,这可能源于他们对当地动物知识的把握,或是当局“种族隔离”的分而治之。1963年,中非联邦解体,罗德西亚战争爆发。南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于1965年控制水坝,原计划的北岸电站建设受阻,直到1975年才重新开工。卡里巴水库的主要投资者赞比亚铜矿用电受限,外加国际铜矿价格猛跌,其无暇顾及后期修建。因此,尽管这个时期赞比西河流域有长达20多年的连续丰水,但卡里巴大坝都未妥善利用,造成了大量弃水。

所有的曲折从未让官僚们失去信心,因为在名义上建造一个不仅能发电、还能提供灌溉用水的多用途水库,并改善流离失所的通加人的生计,不仅充满正义、宽容、仁慈,而且一本万利。在卡里巴大坝建成前,“在一片野蛮的荒野中,人类来了”。^③“人”意味着白人,意味着现代性。在卡里巴大坝建成和发电运营后,卡里巴大坝“自然地”成为白人“人定胜天”的象征,是功绩,是科学的、生态的、美学的、愚公

移山式的,是殖民者拯救原始民族(甚至没有提“通加”的民族之名)的壮举。^④

2. 雅米神与白人工程的角力

从气象记录来看,赞比西河流域最长的洪水周期发生在1952年,赞比西河的每个子流域都产生了大量径流,当地人称之为“Cheia M'bomane”(意为“摧毁一切的洪水”)。^⑤而在卡里巴大坝开始运转的1958年,赞比西河三角洲再次经历了极端洪水,被称为“Cheia N'ssira”(意为“迫使人们生活白蚁丘顶部的洪水”)。

关于非洲水神信仰如何面对现代水库技术的问题,在卡里巴大坝修建过程有两种不同维度的解释。按照通加人的口述史,故事梗概如下:在通加人被迫离开原来的村落后,雅米神对这些没有亲眷的白人(白人工人们通常不会带家眷修建大坝)非常不满,并决定给人们点颜色看看。1950年2月15日晚,来自印度洋的暴风突如其来,席卷了整个村落。这样的事情从未在一个如此持久稳定的、与世隔绝的地方发生过。超过历史纪录的15英寸的降雨持续了数小时。河流当晚就上升了8米之高,不少村子都被淹没了。当营救队伍3天之后到达此地时,他们看到腐烂的羚羊和其他的动物挂在树梢上。由于山体崩塌,营救队伍被迫中止任务。然而,1955年,白人还是决定兴建卡里巴大坝。

这深深地冒犯了雅米神,因为水库不仅将他的臣民及亲眷分隔,也阻隔了他和妻子。于是,在水库建设过程中,雅米神时常制造一些洪水,并引发水库工地的伤亡。可是,白人们仍不信雅米神,也没有听从“神旨”停工。千百年的古树被砍倒用

① 索尔兹伯里,现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在殖民时期的名称,二战后首府发展速度极快。当时殖民者把卡里巴大坝的工资收入宣传得很好,吸引了一大批来自临近地区的非洲劳工。这些劳工中大多数工人来自尼亚萨兰,他们被贬称为“尼亚萨斯”(Nyasa)。罗德西亚本地劳工供应委员会(RNLSC)以每月至少挣3英镑、工作简单住宿条件好、生病得到良好照顾等虚假承诺,吸引了一大批尼亚萨兰的工人。当卡里巴项目于1956年初开始时,联邦电力委员会(Federal Power Board)将RNLSC作为主要的劳工代理,并与尼亚萨兰殖民地政府就特别招募许可证进行谈判。超过2355名“尼亚萨”男子在1956年底前报名参加,他们到达卡里巴后,意识到了欺骗,开始写信回家,强调不好的工作条件。为了安抚还在大坝的工人,劳工委员会保证,将会使那些因公致残或者生病的人也获得完整月薪。但与此同时,劳工委员会在更多的周边区域用同样的方法召集其他劳工。

② Jacques Leslie, *Deep Water: The Epic Struggle over Dams, Displaced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7, p. 118.

③ F. Clements, *Kariba: The Struggle with the River God*, London: Methuen, 1959, p. 13. For a similar interpretation of Clements and related authors, see L. Jarosz, “Constructing the Dark Continent: Metaphor as Geo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Africa”, *Geografiska Annaler*, 74B, Vol. 2 (1992), p. 199.

④ 这些评价广泛存在于西方描述卡里巴大坝的书籍中,包括:Richard Rayner, *The Valley of Tantalika: An African Wildlife Story*, Harare: Baobab Books, 1990; David McDermott Hughes, *Whiteness in Zimbabwe: Race, Landscape and the Problem of Belongi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Terence Ranger, *Voices from the Rocks: Nature, Culture and History in the Matopos Hills of Zimbabw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⑤ Richard Beilfuss, “Understanding extreme floods in the Lower Zambezi River Basin”, *Zambezi River Basin Environmental Flows*, July 2005.

于修路,当地人的房屋需要让位于水库建设。因水库修建导致洪水泛滥,越来越多的通加人必须从下游迁居到其他地方。随着卡里巴湖的水面不断上升,雅米神更加愤怒。在同年的圣诞节前夜,一场未曾预期的洪水猛攻山峡。数月里,洪水反复达到峰值,退却又上升。这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再次讨论起雅米神,但卡里巴大坝的建设仍未停下。可是,只要居住在城里的人们不信雅米神,雅米神就让他们见识他的厉害。1956年11月,卡里巴地区迎来了第三次洪峰。由于强降雨持续了数月,赞比西河洪水的影响范围竟达1300公里,其所涉范围内所有的牲畜都被吞没,这使得原先的河面拓展了一半左右。已经建了一半的大坝被冲毁,导致196名工人死伤。老一辈通加人告诉族人,河流总胜于人,是雅米神制造了这场灾难,并将失踪的人们当作他的祭品。^①

灾难之后,卡里巴大坝的防汛功能被再次提升,以确保相似或者同等规模的洪水只可能千年一遇。继之,雨季再次来临,但干旱却连年加重。虽然通加人认为雅米神还在继续袭击卡里巴大坝,并摧毁了围堰、桥和主墙。但是,卡里巴大坝项目最终还是保留了下来,大坝被加固到5英尺高,赞比西河最终被控制住了。1958年12月,卡里巴大坝修建完成。1960年,大坝开始为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供电。通加民族最终离开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園。

3. “诺亚方舟行动”

20世纪50年代,继《世界人权宣言》后,环境和动物权益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注。^②1959年初,几家本地和国际报纸发表了关于卡里巴大坝淹没原有岛屿、导致岛上动物陷入困境的图文报道。^③这些报道很快引起了西方环保主义者、动植物保护协会和慈善家的注意。为了拯救即将因卡里巴大坝建设引发的

洪水而被淹没的动物,人们开始以一种合乎圣经的方式实施人道主义干预。“诺亚方舟行动”(Operation Noah)随即被提出,其目的是在西方募集公众物资、捐款和财政资源,以回应创世纪时经典语句“将是我与地球之间盟约的象征”,并使卡里巴成为整个罗德西亚工业的动力之源,造就“应许之地”——“一片绵延到地平线、从湖中诞生的丰饶之地”。^④

1959年3月,在大坝封锁三个月后,一系列动物保护行动开始开展。尽管在拯救动物的同时,通加人也开始迁徙,但外界除了意识到通加人迁居的卢萨卡高地有很多野生动物外,并未对通加人本身给予关注。这在相关的财政资源分配上一目了然:对每个动物大概有968英镑的资金支持;而对每个通加人则仅有50磅。^⑤动物和通加人迁居的地方也存在差异:对动物而言,它们需要和原来相似的生活场景及安全的水源地,其中不少土地非常肥沃;但对通加人来说,他们迁居的卢萨卡高地却与原先的赞比西河腹地大相径庭,不但高山崎岖、土壤贫瘠(多为沙地和盐碱地)、高温少雨,而且采采蝇侵扰不断。

按照传统生活方式,通加人捡拾柴火、水果、地衣和食用昆虫,^⑥他们也放牧牛羊,并为了保护庄稼和牲畜免受侵害,捕杀野生动物。但通加人离开故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防止生态超载,管理局和欧洲人可以在保护区内对野生动物进行狩猎。但是,即使野生动物进入邻近的通加村庄,通加人也不允许捕杀它们。除了明显的种族法规之外,通加人因太穷而无法负担“狩猎许可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通加人都不知道殖民当局要求的许可证是什么。因此,通加人只能任由从保护区溜出的动物在他们的村庄中漫游、啃食和破坏庄稼、攻击牲畜。他们唯一“不违法”的做法是,跑到离他们的村庄数英

① 失踪者的家属和搜索队将一只黑色的小牛杀死献祭给河流。次日,小牛不见了,而工人们的尸体却出现在了小牛沉下去的地方。小牛的消失证实了鳄鱼在河流中出没,但工人尸体的再现却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

② 1950年,世界动物保护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 WFPA)成立;1959年,国际防止虐待动物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ISPA)成立。二者共同成为1981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orld Animal Protection)的前身。

③ Malcolm Dunbar 是第一位报道卡里巴大坝将会淹没大量野生动物家园的作者。其文章首次刊于1959年2月的《罗德西亚周日邮报》(Rhodesian Sunday Mail, 15 February 1959)上。

④ Genesis IX: 13-15; quoted in Robins and Legge, *Animal Dunkirk*, p. 175.

⑤ Christopher H. D Magadza, “Kariba Reservoir: Experience and Lessons Learned”, *Lakes and Reservoir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2006, p. 276.

⑥ Per Zachrisson, *Hunting for Development: People Land and Wildlife in Southern Africa*, Goteborg: University of Goteborg, 2004, pp. 91-92.

里之外的管理局,请求当局采取措施予以帮助。不过,当局通常会说:“这些野生动物是你的,他们就像你的牛。如果你的牛摧毁了你自己的田地里的庄稼,没有人会赔偿你。”^①

20世纪70年代初,当局通过《野生动植物法案》,并于1975年允许欧洲农民在农场内保留和追捕野生动物。这部法案延续了20世纪60年代以降对通加等非洲民族的歧视,禁止非洲人进入国家公园等公共领域。然而,管理局却在赞比西河谷实施了大规模的动物杀戮,如羚羊、斑马、水牛等,并以不同的名义卖给公园运营者。这引发了通加人的强烈不满,他们按照传统方法制造简单的工具或者偷盗公园管理员的枪支进行偷猎,继而引发了管理者、运营者和通加人之间的愤怒和相互猜疑。

津巴布韦民族政府于1980年建立政权后,以福利政府的形式在农村区域建立了不少基础设施,但这些基础设施并未完全改善通加人的生存问题。迁居的宾加地区水源本就不及动物保护区,加之旱季时通加人通常与动物共饮水源,导致通加人的饮用水卫生无法保证。宾加地区的水多为高矿物质水,无法用于正常的粮食灌溉,所以粮食安全也没有保障,通加人大多只能依靠政府补助和国际社会的救济。

按照通加的传统,酋长为“土地的所有者”、文化价值的管理者、习惯法的掌管者和农村自然资源的监护人。但1982年津巴布韦颁布《公共土地法案》,宣传酋长和习俗隶属于国家控制。1990年,津巴布韦新政府引入土著资源社区管理方案(CAMPFIRE)来重新配置资源所有权,但令人遗憾的是,该政策的重点是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延续,对农民社区生计的考量仍是模糊地带。尽管政府管理局授予宾加乡村议会“适当的权威地位”,允许其与公共区域的农民协商共同保护和分

配在该地区开发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收益,^②但是,管理局同时又授予了国家公园私人运营者(大多为恩德贝莱人、绍纳人和白人)管辖其领地的全权,这造成当局、狩猎运营商、通加人和酋长在分配和使用土地等自然资源上的持续争议。虽然从理论上讲,动物管理组织(PAC)应负责管理脱离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但因为管理部门批准的狩猎捕猎配额减少,所以他们能射杀的动物数量也相应减少。^③除了受到“法律”保护的经营者,无论是当局、酋长,还是通加人,都无法掌控国家公园。

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给通加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但即使是当地政府或者酋长,也没有权力对野生保护区内的动物做出决定。很多时候村民们需要整夜燃起篝火,不时敲击铁罐,以便让象群远离作物。而在通加人的记忆中,象群原先一直是和人相安无事的,只是如今象群才肆无忌惮地侵犯人的领地。^④“我们很难获得收入。我们大多数人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没有工作。我尽量保留山羊和牛,但狮子等野生动物会来吃它们;我在田地里耕种,但大象会来吃它们。我没有什么可以去市场上换回收入。我没有办法支持我的家人。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想到(赞比西)河(过去)的生活。那时,我不会有这些问题。”^⑤

四、转型与升级

1. “应许之地”

为了使卡里巴成为整个罗德西亚工业的动力之源,灌溉大片土地并成为丰富的渔场,白人用“应许之地”来描述卡里巴区域的发展——“一片绵延到地平线、从湖中诞生的丰饶之地”。^⑥基于这样的“崇高理想”,南罗德西亚政府在卡里巴沿岸划定了整条海岸线作为休闲的国家公园所在地,并寄望于“(卡里巴)将使乞力马扎罗山、维多利亚瀑布和金字塔等国际旅游景点都黯然失

① 津巴布韦大学教授M口述访谈资料。

② 1998年,津巴布韦同时颁布《传统领袖法》(Traditional Leaders Act of 1998)和《农村议会法》(Rural District Council Act of 1988)。前者承认酋长是土地所有者、文化价值的管理者、习惯法和农村自然资源的监护人。酋长们理应按照管他们的地区,防止过度种植、过度放牧和砍伐森林。后者规定酋长及其农村领域都从属于国家,国家可以不经他们的同意对所有的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和开发。

③ D. H. M. Cumming and T. J. P. Lynam, *Landuse Changes, 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Utilisation,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Agro-ecosystems in the Zambezi Valley, Final Technical Report - Volume 1*, August, 1997.

④ Chief's Sinasengwe's comments in "Binga Farmers Cry Foul over Prices offered by Cotton Buyers", *The Zimbabwe Chronicle*, 7 July 2009. p. 57.

⑤ Tremmel Michael, *The People of the Great River: The Tonga Hoped the Water Would Follow them*, Gweru: Mambo Press, 1994. p. 53, p. 58.

⑥ Genesis IX: 13 - 15; quoted in Robins and Legge, *Animal Dunkirk*, p. 175.

色”。^① 1958年,当通加人迁往卢萨卡高地时,殖民政府沿着湖岸为通加人设计了“本土”的通加渔村,英国高级专员还宣称“通加民族可从开采湖泊的资源中获得无法衡量的收益”。^②

1958年12月,在卡里巴大坝关闭大坝墙、卡里巴湖形成及之后的一段时期,大量从淹没的陆地中浸出的营养物质促使鱼类物种,如老虎鱼(tiger fish)、红胸鳊鱼(red breasted bream)、白鳊鱼(white bream)和鲶鱼(cat fish)快速繁殖。参与新兴渔业的发展,可以获得高捕捞量和经济收益。^③ 殖民政府宣称将让通加人优先进入新兴水域,并计划投入资金发展一个强大的渔业部门,最终通过市场机制的刺激,将通加民族转变为专职渔民。^④ 不过,愿景和事实的差距在于,直到1962年《卡里巴渔区管理法》(*Kariba Controlled Fishing Area Regulations*)出台,通加人才开始在居住的周边合法捕鱼,而这是在北罗德西亚政府允许在北部海岸线捕鱼的三年之后。南罗德西亚政府声称,他们推迟向湖边的通加人发放捕鱼许可证,是因为他们希望鱼类种群稳定。

20世纪60年代,钓老虎鱼活动开始流行,来自南非和欧美多国的垂钓者们纷纷来到卡里巴湖进行国际比赛。由是,南罗德西亚政府将卡里巴湖划入“国家公园”范畴,并将农业活动视为对其保护使命、美学价值和旅游潜力的威胁。^⑤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1980年,随着津巴布韦独立战争越来越激烈,殖民当局为阻止津巴布韦民族主义战士,在靠近湖泊的道路上埋置地雷并摧毁了辛那宗地区(Sinazongwe)所有的大船,卡里巴湖周边的捕捞活动得以平息。直到1980年,全新的津巴布韦民族政府建立,宣称“结束帝国主义的剥

削,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更大和更公平的自主权,并促进国民和国家参与和拥有大部分经济”。^⑥ 和邻国赞比亚一样,新政府采取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形态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形态,鼓励建立合作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制造业、养殖业、渔业的发展。但是基于《兰开斯特大厦宪法》所规定的对白人财产的保护,^⑦ 新政府怀有根据社会主义议程对贫苦大众进行经济赋权的良好初衷,最终和之前殖民当局推行的合作社举措别无二致。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通加人的村镇里没有学校、诊所、商店、电信服务和道路等政府原先承诺的基础设施,所以渔民即使捕捞丰收,也没有市场可销。

20世纪90年代,随着津巴布韦对景观改造和旅游业重视程度的提升,^⑧ 卡里巴湖为世界各国游客提供了更多的旅游可能性:自然美景游览、国家公园参观、垂钓赛事、狩猎、摄影、观鸟、游泳、蹦极、游艇、漂流等,卡里巴湖也成为津巴布韦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之一。雅米神被制成了各种工艺品吸引游客,神奇的故事不断增加着当地的吸引力。然而,通加人仍然没有从中受益。景观是社会关系构成的组成部分,并为想象的身份提供了物理模板,是集体自我概念的构建基础。^⑨ 之前通加人居住的景观是他们集体自我概念的构建,如今迁徙所带来的空间错位破坏了通加人与土地、空间以及自然资源的关系。卡里巴的旅游产业主要由白人和津巴布韦的恩德贝莱人、绍纳人经营,通加人在历史进程中早已远离这些水域。通加人以渔业、作物生产、牲畜饲养为主的传统生活方式,已完全让位于非洲被动工业化引发的劳务移民(前往城市地区和采矿中心)所带来的新生活方式。

① K. Meadows, *Rupert Fothergill: Bridging a Conservation Era*, Bulawayo: Thorntree Press, 1981, p. 175.

② Palmer Robin, *Land and Racial Domination in Rhod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 22.

③ FAO Fisheries Technical Paper 426/2, Rome: FAO of the UN, 2003, p. 206.

④ M. F. C. Bourdillon, A. P. Cheater and M. W. Murphree, "Introduction" in *Studies of Fishing on Lake Kariba*, pp. 15-17; Carlisle G. D., *The Role of the Rhodesian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t Lake Kariba*, *Kariba Research Symposium*, Kariba: Lake Kariba Research Institute, 1965, p. 8.

⑤ J. C. Jackson, "The Artisanal Fisher of Lake Kariba (eastern basin): A Socio-ecological input into Lakeshore Planning and Fisheries Management", Harar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CASS, 1991.

⑥ Government of Zimbabwe, "Growth with Equity: An Economic Policy Statement", Harare, Zimbabwe, Government Printers, Government of Zimbabwe, 1981, p. 2.

⑦ 布莱恩·拉夫托帕洛斯, A. S. 姆拉姆博:《津巴布韦史》,张瑾译,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197—199页。

⑧ 1996年,津巴布韦正式颁布《旅游法》(*Tourism Act of Zimbabwe*),以促进该行业的有序发展。

⑨ H. Morphy, "Colonialism,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in Northern Australia", in B. Bender (ed.), *Landscapes and Perspectives*, Providence and Oxford, Berg, 1993, p. 205.

2. “土著文化运动”和“反坝运动”的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土著民族兴起了争取土著文化权利的运动。1982年,联合国设立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审查有关促进和保护土著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情况和进展。1989年《土著和部落民族公约》重申了保护土著人民的权利并保证和尊重他们的权利完整性。随后,1995年至2004年被定为“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国际上对“土著”的界定,一般指主要民族之外的定居者。获得这一身份认定后,相关人员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物质补偿。通加的一些政治积极分子利用这一契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为边缘化的通加人谋求更好的生计权。不过,通加人不同意把自己界定为“土著”,而决意将自己置于津巴布韦历史的中心。他们认为,与不同时期迁入津巴布韦高原的白人群体不同,也与当今在津巴布韦占主导地位的绍纳族和恩德贝莱族不同,通加民族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只是他们在漫长的历史中丧失了自然资源的话语权,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的祖辈为卡里巴大坝的建设被迫迁居,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因此,现在宾加地区的土地、水和野生动物,都应属于通加人。但是,通加民族的义愤填膺除了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并未产生更多的实际成效。由于缺乏进展,通加人几乎依靠各种慈善机构的援助过活,^①但总统穆加贝多次将国外援助指控为“外国势力控制”津巴布韦的“证据”,这进一步削弱了国内外协同应对通加人日益加深的危机的能力。^②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致力于保护生计和生态的“反坝运动”在国际上兴起。在国际河流网络(IRN)的组织下,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与了环境测评和生态综合发展项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WCU)设立了世界水坝委员会(WCD),除了分析水坝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影响外,还旨在

制定国际上可接受的大坝规划、设计、评估、建造、运行、监测和退役的标准。世界水坝委员会选择卡里巴水坝作为世界十大水坝之一,并进行案例研究,广泛审视水坝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影响。其报告指出:卡里巴水坝不仅让通加人失去了土地、资源和生计来源,也造成文化认同危机、就业困境及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当局应为通加人“赋予流离失所者以新环境的管理权,使他们拥有在原有环境中的自信 and 安全感”。^③

一批受过教育的通加年轻人受此鼓舞,成立了一系列组织,如宾加发展协会(BIDA)、宾加天主教正义与和平委员会(CCJP)等,主张改变依赖援助、外来者主导当地经济的现状。赞比亚西河管理局受到影响,^④于1996年提出“诺亚行动重新启动”计划。在调研了通加人的生计现状后,管理局认为其穷困的原因是长期缺水、粮食短缺、野生动物威胁及基础设施匮乏。因此,管理局确定了一系列社区赋权项目以促进通加人自给自足,包括引进磨煤机、饲养山羊、添置捕鱼设备,以及建造小型水井和实施灌溉计划,以缓解生活和农业用水短缺问题。^⑤1997年,管理局设立了赞比亚西河谷发展基金(ZVDF),为赞比亚流离失所者提供个人补偿和协调社区发展项目,并期望从赞比亚政府和津巴布韦政府筹集活动资金,例如从卡里巴水力发电项目中征收1%作为发电的水费。^⑥不过,由于管理局没有法律约束力,其帮助通加人多基于道义和社会责任。大众媒体虽广泛宣传对通加人的大量援助,但这些援助并未从根本上改善通加人的生活。

20世纪90年代末期,津巴布韦开始遭遇经济大衰退。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福利主义”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新自由主义”备受争议,2000年后经济形势加速下滑,至今未得起色。受到民族区域主义(ethno-regionalism)的影响,在2000年津巴

① 拯救儿童(英国)丹麦志愿者服务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如Africare、Christian Care、Novib、Redd Barna等)专注于救济,特别是食品救济、学校、道路和灌溉等发展项目。

② 布莱恩·拉夫托帕洛斯、A. S. 姆拉姆博著:《津巴布韦史》,张瑾译,第250—259页。

③ Soils Incorporated, “Kariba Dam Case Study: Zambia and Zimbabwe”,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Harare: Private Limited, November 2000.

④ 最初是基于中部非洲议会所设想的国内外水力发电项目监理,于1964年成立。1987年10月1日在中非电力公司(Central African Power Corporation)重组之后,管理局再次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议会同时通过立法成立。赞比亚西河管理局主要负责卡里巴大坝的运行和维护、分析和传播关于赞比亚西河及卡里巴湖相关的水文和环境信息。

⑤ Michael J Tumbare, et al., *Kariba Dam's Operation Noah Relaunched*, Kariba: Zambezi River Authority, Harare, 1997.

⑥ Leonissah Munjoma, “Zambezi River Authority Champions Development in the Zambezi Valley”, *The Zambezi*, 2007.

布韦土地改革时期,通加人普遍认为,无论执政党基于种族主义的判断作出何种土地分配决定,这些土地从来都不是由白人继承而来的。^①所以,当政府准备加强对土地权的重新配置时,一些通加农民开始对周边土地进行侵占,以显示自我赋权的努力。^②他们公开宣称:“宾加地区的所有土地、水域和野生动植物都属于通加人。”^③2002年,巴希尔维兹信托基金(Basilwizi Trust)成立,旨在将卡里巴大坝历史补偿的范围拓展到其他地区,为所有流离失所的受害者及其后代提供赔偿。至今,在津巴布韦的55个地区中,宾加地区仍是被管理者忽视或被置于发展最末端的区域。通加人原来的家园已变为拥有强大发电能力、丰富渔业资源、生态旅游和休闲观光产业的国家保护区,但通加人似乎从未搭上发展的便车。

如今,通加民族已逐渐失去对雅米神的信仰,仅在遭遇极端天气时,才会再次提到雅米神的愤怒。卡里巴坝区时常发生微型地震,通加人将其解释为:雅米神希望见到他的妻子,正试图切断阻碍他的大坝围墙;当他没法穿越时,便通过地震的方式发泄怒火。老一辈通加人曾经试图让后辈相信,终有一天雅米神会将大坝摧毁,实现他对通加人的保佑,以更大的洪水摧毁巨大的水泥墙,让他们返回河岸的故乡,重新过上好日子。不过,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雅米神形象的物品如今已成为当地旅游的伴手礼。原先出现在酋长权杖上的雅米神,如今被用木雕、石雕和骨雕塑造(偶尔也见于象牙、银饰或金饰之中),以珠链点缀,作为象征好运的礼物。

3. 卡里巴大坝扩建的“中国效益”

2000年后,赞比西河进入一个比较短的丰水期,但由于没有充分利用弃水,护坦的冲蚀程度加剧,下游的350万人口受到直接影响,卡里巴大坝的安全风险又一次受到广泛关注。此外,近年来南部非洲降雨量不足,水库水位较低,致使依赖水

力发电的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均出现严重电力赤字,供电形势紧张。仅津巴布韦一国,每月用于进口电力的花费就高达2000万美元。如何维护和利用好卡里巴大坝,成为当代国家发展的又一关键课题。

面对伤痕累累的卡里巴大坝,地质难题的修复、水电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再就业都是新世纪的难题。此时,中国政府提出支持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实现发展繁荣,并提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借此契机,赞比亚与津巴布韦政府在公开募资之后,进一步考量了技术支持和人力培训等方案,最终都选择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作为大坝南北岸扩机工程的设计施工方。从爆破单耗到机组标准,^④中国让两国都连连夸赞。在中国与津巴布韦签订的卡里巴大坝扩建商务合同中,15%的金额专门用于采购当地材料和设备。依托这个项目,多家当地公司获益颇丰。^⑤受雇于中国企业的当地居民不仅挣钱多,还能学到新技术。在项目扩建过程中,许多当地人成为能胜任电焊、金属制作、推挖机操作、汽车驾驶等工作的“技术多面手”,提升了收入,改善了生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项目部还向当地学校捐建教室,为当地社区修缮道路,联合中国援津医疗队在卡里巴镇开展义诊,应当地政府请求参与重大交通事故救援等,以实际行动悄然改变着卡里巴小镇居民的生活,受到当地民众和政府官员的一致好评。单在津巴布韦,项目累计提供了超过3000人次的就业机会。^⑥另外,由于项目位于津巴布韦动物保护区内,项目部积极与当地环保部门沟通,做好环评工作,在生产活动中合理安排施工,尽量减少项目对保护区环境的负面影响。项目部还聘请当地国家森林公园人员开展动物保护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的动物保护意识。^⑦中国良好的履约能力、施

① William H. Shaw, “‘They stole our land’: Debating the expropriation of white farms in Zimbabwe”,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2007.

② 包括思嘉拉/莫拉森林(Sijarira/Mzola forests)、迟特/迟拉雷国家公园(Chete Safari Area and Chizarira National Park)等。

③ Terence M. Mashingaidze, *The Kariba Dam: Discursive Displacements and the Politics of Appropriating a Waterscape in Zimbabwe, 1950s-2017*, Limina, 2019.

④ 刘畅:“津巴布韦卡里巴南岸水电站扩机项目进展顺利推动中津经济合作”,国际在线,2015年2月27日。

⑤ 界面新闻:“我们给津巴布韦留下来一座水电站”,<https://m.jiemian.com/article/2432182.html?from=timeline>, 2018年12月25日。

⑥ 驻津巴布韦使馆:“津巴布韦总统出席卡里巴南岸水电站扩容项目竣工仪式”,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lz_677316/1206_677824/1206x2_677844/t1547800.shtml, 2018年4月1日。

⑦ “这里的石头会唱歌——中国电建津巴布韦卡里巴南岸扩机工程建设纪实”,<http://www.focac.org/chn/zfgx/jmhz/t1524588.htm>, 2018年1月1日。

工过程中体现的“中国速度”和“中国质量”,以及造福当地社会的决心,受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各界的一致认可。^① 卡里巴大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似乎开启了新的篇章。

五、结语:自然资源的利用与赋能

卡里巴大坝的历史进程展现了自然和环境的可塑性,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类互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展现了历史进程中生态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同时,卡里巴水权、水资源利用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还揭示了环境与文化、景观与经济等多重相关性。从整个非洲的视域来看,以通加人为代表的非洲水利社会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原生的水利社会的特征被殖民化和工业化的特征逐渐取代,而新的现代化特征并未随之形成,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严重滞后。另外,大多数非洲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水利等公共服务,导致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错位或陷

入困境。随着传统非洲水利社会的解体,新兴的非洲民族国家尚无法对地方和民族形成有效治理,民族和国家的互动不畅,一直依赖水利社会生存的非洲少数民族利益难以保障,国家的资源调配能力也较为有限。

如今,一些通加人仍自称为“河流人”(Basilwizi),把卡里巴坝区称为“通加土地”(Tongaland)。这样的命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铭记他们与赞比西河的历史联系,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自我定位策略,用于维护他们在卡里巴水景观和资源中的权利正当性。通加长老仍坚持口述历史传统,铭记着卡里巴大坝建成之前当地人与外来人的对话。他们简单地沿用对卡里巴区域的称呼:库卫兹(KuLwizi)、河流或赞比西河。他们似乎仍能通过故事穿越回那个久远的水乡泽国,享受与雅米神相敬相亲的时光。如何将他们的民族利益与身份想象融入赞比西河的水电现代化发展进程,恐怕是需要坚守之余深入思考的话题。

Civilization Interaction in Africa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 Case Study of Kariba Dam

ZHANG Jin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local water conservancy society in Africa is based on the kinship-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and mainly governed by chief and traditional believes, and has little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e large-scale water conservancy design promoted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has marginalized the traditional African society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ir treatment was sometimes worse than that of animals. After the African nation-states won their independence, the locals fought for new identity and interests encouraged by outsiders but were still to be excluded to the benefits of Modern projects just like Kariba Dam. China's arrival in the new century seems to show a promising beginning for external involvement, provided that Chinese projects can respect local interests and rights, and empower communities to make better use of their natural resources.

Keywords: history of water conservancy; water history; Kariba Dam; Tonga people; civilization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中和)

^① 驻赞比亚使馆:“杨优明大使出席卡里巴北岸水电站扩机项目竣工交接仪式”,<http://zm.china-embassy.org/chn/sgzxdthxx/t1185493.htm>, 2014年8月25日。